

苏联顾问 在中国

1923—1927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

Советские добровольцы о первой
граждан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войне в Кита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А. С. Перевертайл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1

苏联顾问在中国

(1923—1927)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化部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 $\frac{1}{2}$ 印张 98千字

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800册

统一书号: 11190·060 定价: 0.44元

限国内发行

译 者 的 话

本书收入了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即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国民革命军中的四名苏联军事、政治顾问的回忆录文章和日记。他们是恩·依·康奇茨、斯·恩·纳乌莫夫、耶·弗·捷斯连科和莫·弗·库马宁。

康奇茨系一九一九年即加入苏联红军的老资格的指挥官，在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历任师长、副军长等职。一九二五年六月前来中国，是年九月抵达广州，先后在何应钦部第一师、程潜第三路军、李济深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程潜第六军充任军事顾问和首席顾问，并在国民革命军中苏联军事总顾问布留赫尔（加伦）的总部担任要职。一九二七年初回国。他的《在中国国民革命军里》一文，主要是作者在中国写下的日记，反映了作者的直接观感。自一九二五年十月至一九二六年四月近一百五十天（偶有中断）的随军日记，对于国民革命军的组编、官兵的情况、当时各界人士对于国民革命军的态度、国民革命军的战斗生活、行军路线、乃至日常生活，均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作者通过对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邓本殷等战事的描写，对于蒋介石的虚伪、诡诈，对于国民党右派，对于军阀相互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及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反动派反对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事业，作了一定的揭露。对于当时我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作

用和功绩作了积极、肯定的评价。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时的一部分历史真实。

耶·弗·捷斯连科一九一七年年底加入赤卫队之前，即参加了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一九一八年入党，国内战争期间，随红军转战于各个战场。毕业于苏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一九二五年五月来到中国，先后在黄埔军校、广州独立一师（师长吴铁城）、叶挺独立二十四师任军事顾问。回国后，担任军工部门的领导职务。一九五七年随代表团曾来中国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并在北京探望了何香凝女士。他的《从广州到武汉》一文，主要描写第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中历次大的战役，其中包括南昌战役。作者对历次战役中诸如敌我双方的意图、兵力布署、作战计划、战役等情况，乃至一些伤亡数字，一一作了叙述，提供了较为详尽的战地实况。文章涉及到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若干方面，粗略地展现了这段历史时期内复杂的形势、错综的关系和众多的矛盾。作者赞扬了（尽管是肤浅地）我党和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斯·恩·纳乌莫夫系布尔什维克党的老党员，一九一八年加入红军，国内战争结束后，在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从中国回国后，在军队中致力于科研及教学活动，曾任军事出版社主编。一九二五年四月来到中国，先是在张家口、开封、洛阳冯玉祥部，后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起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顾问。北伐期间，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职，曾参与筹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一九二七年五月回国。他的《黄埔军校》一文，是作者任黄埔军校政治顾问期间的一段回忆。作者来到黄埔军校，正值黄埔四期。文

章即以该期为主，引用资料，概括地介绍了学员、特别是教官的情况、军校的课程设置、训练方法，而着重叙述了军校中我党如何冲破以蒋介石、戴季陶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的种种阻挠，积极开展和普及政治工作、扩大我党影响、争取和团结进步学员、壮大革命力量的事迹。

莫·弗·库马宁也是苏共一位老党员。一九一八年加入红军。国内战争中历任炮兵营长、步兵旅长等职。卫国战争时期担任海军领导职务。一九二六年来到中国，曾任黄埔军校和贺龙第二十军的顾问。参加了北伐，并随贺龙队伍进军南昌。一九二八年回国。他的《南昌起义》一文，主要写了一九二七年五月以后北伐军北上，扫荡和击溃吴佩孚残部、张作霖部的许昌、郑州大捷，而以主要篇幅记述了贺龙第二十军和叶挺第二十四师进军南昌和在南昌举行起义之后继续南下的战斗历程。

上述四位作者在书中回顾了他们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亲身经历，引用了若干未经发表过的资料，并对有关问题和人物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评价，可供我们研究我国大革命历史作参考。原书的绪论《苏联志愿者在中国》因为资料不多，我们没有译出而从略了。

原书中摘引了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孙中山先生等人的讲话及其他有关书刊资料，我们都是直接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未经核对，请勿引用。

书中注释，除在注文后面标有“译者”字样的以外，一律为原版本所有。

本书是根据苏联东方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志愿者谈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一书（莫斯科一九六一年

版)，由帅永章翻译、林荫成校订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目 录

在中国国民革命军里恩·依·康奇茨 (1)

从广州到武汉耶·弗·捷斯连科 (81)

黄埔军校斯·恩·纳乌莫夫 (110)

南昌起义莫·弗·库马宁 (124)

在中国国民革命军里

恩·依·康奇茨

一九二四年，革命力量的统一战线建立之后，孙中山政府在中国南方的广州附近创办了黄埔军校，聘请了一批苏联人民志愿者担任组编国民革命军和培训军事干部的军事专家。

年轻的国民革命军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使广东全省统一由革命政府来领导，并就地建立今后为解放全中国进行斗争的巩固的根据地。当时，国民革命军在广东的主要敌人是军阀陈炯明。

一九二五年二至三月间，国民革命军取得了第一次东征陈炯明的胜利，但到一九二五年九月，陈却又重整人马，东山再起。当时陈炯明的反革命军已占领了广东省的大片地盘，革命政府管辖的地方只剩下了广州地区和广州东北部的广州至韶关铁路沿线。

一九二五年九月底，军事和政治形势对国民革命军都极为不利。有消息说，一些军阀打算联合进攻广州：东有陈炯明（约二万人），西南有邓本殷（约二万二千人），北有熊克武（近一万人）。同时，北方的反动政府派了三艘炮舰到香港，帮助陈炯明攻打广州。

在广州，情况也远远不是可以高枕无忧的。驻扎在海南岛的一个军长李福林将军是完全靠不住的，不能排除他

会反对革命政府的可能。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驻扎在广州附近的广州独立一师师长吴铁城，与国民党右派串通一气，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很容易投到军阀一边的。

在广东全省，地主到处都在捣毁农会。革命的敌人从香港的英国当局得到了金钱和武器。港英当局认为摧垮国民革命政府是制止省港大罢工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商人以及那些不相信国民革命政府能稳固下来的有产阶级分子挤满了银行，提取存款。所有这些，自然都给广州政府已经拟定的作战计划造成了一系列财政上的困难。

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的领导机关——军事委员会在一次会议上认定，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广东省境内的那些反革命将领。因此，作出了立即肃清他们的决定。这一任务交给了蒋介石，为此交由他指挥的部队有：第一军的第一师和第三师（六千人）；第四军，不包括梁鸿楷将军的第十二师（近六千人）；集结在三水的三水纵队（张国将军的第一旅和魏杨将军的第九旅，共近三千人）；程潜将军的部队（近二千人），共约二万人。

决定派出的掩护部队有：陈铭枢将军的第十师和梁鸿林^①将军的第十二师阻击邓本殷部；第三军和第四军阻击熊克武部。

第一军第二师的王懋功师长负责保卫广州市，用黄埔军校的学生及第二、第三军的军校的学生加强广州卫戍区，海军和李福林将军的第五军也归王懋功调遣。

* * *

① 梁鸿楷因廖仲恺被刺一案，被蒋介石扣留在黄埔军校，梁鸿楷所部也被改编为第四军第十二师，隶属于李济深，师长为梁之胞弟梁鸿林，所以康奇茨在前边写的是梁鸿楷、后边又写成梁鸿林。——译者

一九二五年九月我来到广州。通常，新到广州的顾问都要到黄埔军校熟悉一下当时的情况。但是，由于当时形势紧迫，我马上就被派到了第一军第一师，在此开始了我的工作。这个师集结在惠州城西，它的任务是要攻取惠州城。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了我下边的日记。它是我在中国国民革命军里工作期间，尽力按时写下的。日记记录下了从一九二五年十月到一九二六年四月这一时期的主要事情。

国民革命军的第二次东征

十月一日

第一师原定天亮以前就集合出发。规定第一团于清晨五点上车。我想看一看军事上的情况，所以就去了车站，但是第一团到下午五点却还在上车！

第一师要开赴前线的消息传遍了全城，这样对待军事秘密是不行的。

十月二日

全师作好了出发准备，但是军列发车很慢。我问师长何应钦，在出发站和终点站有没有人监督上下车的情况，他回答说没有，还说这是军部的事情。

师部上车的时间原定为十二点，后又改为十六点，而现在已经十八点了，我们却还在车站上坐等。为了预祝胜利，大家喝了两瓶香槟酒。按照行军的方式，用茶缸作酒具，用橙子下酒。我们为胜利、为全师、为准备从敌人那里缴获二万支步枪、二十挺机枪和四门大炮而干杯。火车终于开动了，车厢里闷得令人窒息。

二十三点十分到达新塘。临时住在一个祠堂里，睡在供桌对面。供桌上供着死者的灵牌。一夜平安无事。

十月三日

师部从早晨就开始办公。检查了各团的安置情况。发现第一团团部不设值班员，各营营部也没有设值班员，警卫也没有指派。只有守卫桥头的一个排按时上岗了，这个排的哨兵非常清楚自己的职责，对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回答得有条有理。排长在哨位，整个排完全按规定分成了值班和休息两个部分。为了察看前面的地形，派出了巡逻队。

每到一处，我都与人们谈起关于如何布置固定哨和流动哨的问题。

十月四日

一清早就同师长去察看新塘的四郊。居民们亲切地欢迎我们。所有的店铺都正常营业。

十二点定出了防御计划。

十三点三十分，斯·弗·沙尔费耶夫（С.В.Шалфеев）、恩·阿·舍瓦尔金（普里贝列夫）顾问和他的翻译坐装甲列车到达这里。我向第三师的顾问弗·恩·帕纽科夫（科米）建议，把掉队的第九团调到其他部队去。

十六点，我们坐装甲列车去石龙。列车上的装备极为简陋：都是普普通通的货车车厢，蒙上一层铁甲，而且是粗制滥造的，没有车厢平台。装甲列车有一节普通的二等车厢，师部就设在这个车厢里。

二十分钟后，到达石龙。这是一个小地方，居民们待我们很好。我在石龙过夜。天气闷热，尽管有蚊帐，但蚊子咬的还是很厉害。早晨七点半，装甲列车往回开，二十分钟后又回到了新塘。

十月五日

师部工作进行正常。在预定的行军路线上，凡是要经过的道路，都派出了侦察兵。制定了师的防御计划并绘出了相应的草图，刻印出来后分发至各团。这在从前是从未有过的。

师长对我们非常关心，甚至关照给我们买餐叉和勺子。

十月六日

早晨，我与师参谋长一起观摩了第一团一个排的射击训练。战士们都很年轻，当然，知识也很差。教官（一个班长）把战士排成一线，发出口令：“标尺定七”！其实靶距不过才二十至三十步远。战士们对标尺和准星的用途一无所知。

全师预定第二天出发。十八点三十分，蒋介石和他的司令部坐火车来到这里。当时在司令部工作的有弗·普·罗加乔夫和亚科夫列夫等顾问。决定派第三师和第二师的第四团（顾问是恩·阿·舍瓦尔金）进军博罗，以便直接攻占惠州城。

十月七日

今天集合的时间不长，但还是拖到七点半才出发。

第一团打先锋，但他们却没按指定路线行军。师部在十一点三十分才追上他们，当时他们正在“三棵树”村口渡河。（必须指出，一团人竟然只用两只舢板渡河！）令人奇怪的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师部和卫队竟然跑到前边打先锋了。

士兵们情绪饱满，队伍拉的不长。广东的道路又糟又窄，各个兵种行军都只能排成一路纵队通过。这样一来，炮兵连就只得把炮拆开搬运（四个人抬一个轮子，八个人

抬一个炮身，等等），所以炮兵队伍拉的有几百步长。从新塘到佛塘村总共才有二十二公里的路程，可是走到那里已经是十六点十五分了。

十月八日

昨晚师部的工作很紧张，拟定了第二天的命令。关于只用一个团的兵力去攻打惠州城的决定使我感到吃惊。这个打算起码是冒险的，如果第四团夜袭惠州，或许还能成功，但是也要有第三师在必要时给予支援。行动要有十分把握才对，第三师反正没有什么任务。

晚上，我考虑非改组师部不可，必须给师部机关的军官重新分工。在这以前，师里没有诸如值班参谋之类的规定。我起草了全师行军中的命令草案（参照当地情况）。

我同参谋长和军官们谈了如何组织行军、下达战斗命令以及管理全师和参谋部的问题。参谋长要求把参谋部的职务分工方案译成中文。这个任务由我的翻译明天完成。

十月十日

七点出发。在湘苏村停下，在大庙里宿营。庙内，四面都是泥菩萨，正中是供台，帷幔后边也供着一尊佛像。

我同翻译绕村子走了一圈。村子相当大，房子都是石头砌的，房子盖的密密麻麻。

在大庙前面开了一个大会，人来的不多，主要是士兵。在演讲人面前照例摆上糖果、水果、花生和留声机。讲完话以后，就请到会的人吃东西，然后又听留声机。

战士们的医疗条件不佳。病员相当多，没人抬他们和替他们携带枪支。必须分段建立医疗站，哪怕每隔六、七十公里设一个也好，当然还要留一个排来保卫。

我和副师长商量的征用民夫的事。最好把这件事委托

给政治部去办。在群众大会上应当把国民革命军与军阀的军队作鲜明的对比，说明军阀是强行抓他们去当苦力，而不给他们一个钱。

国民革命军应当做到使苦力自愿加入革命军。我建议把镇上的代表、各乡乡长召集在一起，给他们讲明这一切并请他们把这些意见转告居民。必须保证对苦力友好相待。在一个点上驻扎的兵力不应多于一个连。

今天副师长问我对攻占惠州城有什么看法，我谈了自己对围城的想法，谈了与中国的城堡相比欧洲现在城堡的作用和意义。

十月十一日

七点半出发。开始，行军毫无秩序，原来指定炮兵走在队伍的中间，但他们几乎跑到了队伍的最前头。卫生员也不知为什么跑到前边去了。我不得不把这些情况告诉师参谋长。经过我们的努力，部队开始有组织地前进，并且毫不疲倦地到达了博罗。我得出结论，各营之间必须保持一、二公里的距离，这样，既可以保证队伍不停地前进，又可以使士兵保存体力。

十三点到达博罗。在大庙中宿营，里边有好多泥菩萨。

十月十二日

何应钦将军和他的顾问阿·依·切列潘诺夫回来了。他们去惠州城外察看了地形。国民革命军部队的集结行将完成。今天午后首先要向城内连续进行炮击。攻城时间定在明天十四点。要拿下此城是很困难的，因为它四周都是又高又厚的城墙，并且还有护城河，只有从南面的一条陆路可以接近城墙。惠州城四面环山，敌人没有占领这些山

头是一大失策。城防军（有二千到二千五百人）本可以派出五百人占领这些山头，设法削弱围城部队，打散这些部队，凭借制高点进行阻击，然后再退入城内。迄今为止，还未曾有人攻入该城，曾经有人攻打几十次，但是都没有成功。

十月十三日

上午十点开始轰城，天空出现一架飞机，它的任务是向该城投掷炸弹和散发传单。

我建议下达命令，让所有的军官和士兵各就各位，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并经指挥员的许可才可离开。

我视察了第一团。他们在电话里交谈部队的组编秘密，下达各种战斗命令。应当告诉他们不能这样做，尤其是从十四点，即攻城时间开始，更应当提高警惕。

十四点：飞机飞来飞去，大概发起攻击了。在博罗的黄埔第一师中，苏联顾问只剩下我一个人。副师长去当城防警备司令了。派了个参谋去前线司令部，了解部队的人数和编制。我建议要准备把全师用帆船调上去（从博罗到惠州城约十二公里），为此应当预先把帆船准备好。

十五点：师长打来电话，说第四团和第三师已接近惠州城的城墙，向城里打了许多发炮弹，估计再过两个钟头就可以攻进城了。司令部对战绩非常满意。

所有未能参加围城和攻城的人都深感遗憾。我对他们说，必须要有精干的、强大的预备队才行，万一受挫，整个战役的担子就要落到我们预备队肩上了。所以，我们的部队也是攻打惠州的参加者，我们随时都要做好出动的准备。

十七点：惠州城北门被炮火打开了，但是敌人对着城

门布置了两挺重机枪，这样一来，就连最勇敢的战士也无法冲进去了。用了六百发炮弹才把西门和南门摧毁。

二十点：第四团尚未攻进城里，还只是包围着它，准备在二十一点从城墙上冲进去。师长要求马上把现有的炮弹和机枪子弹都运到城边，同时立即打电报给广州，要他们尽快把炮弹和子弹运来。他一再强调必须为突击队准备好饭食——米饭和蔬菜，并且必须调来应急的船只，以便运输兵员、粮食和弹药，因为，需要把本师的一部分兵力继续向惠州推进。

第四团的刘团长负伤了，同时还有其他人伤亡。

听到攻打惠州的战绩后，博罗的农民放起鞭炮来庆祝。

十月十四日

八点：没有什么新消息。夜间停止了进攻。早晨开始轰城，炮弹打光了，停止了炮击。第八团离城还很远就停下了，第四团也未能攻进城，至今还在离城四十公里的地方。双方还在对射，我方的损失看来不会很小。

昨夜送出的弹药尚未送到惠州城边。很显然，进攻得在十二点开始。

十一点：师政治部主任来了。他说战斗仍在继续进行。

第四团的刘团长因伤势过重牺牲了。第四团伤亡近一百人。夜里，从城里传出了阵阵歌声和音乐，这是敌人在装出对我们的进攻满不在乎的样子。

十三点：为围城部队运送炮弹的军官回来了。城里的发电站被破坏了，没有电。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因为城墙四周都围上了通了电的铁丝网。

在师部里，人们的情绪不高。

十七点：对惠州城的射击和包围还在继续，黄埔第一师的所有弹药几乎都打光了。

十七点十五分：收到情报说，第四团已冲进城里。大家都很高兴，情绪立刻变了，师部里顿时热闹起来，各团都准备放鞭炮庆祝。

十七点四十五分全部拿下惠州城。敌人拼命逃窜。我们把攻克惠州的消息告知吴铁城师，希望吴铁城在敌人的退路上布置下强大的兵力，以解除逃敌的武装。

十八点：我同副师长一起视察了野战医院。大部分伤员伤的是手和脚，一位腹部受伤的连长死掉了。

石龙城里已经贴出了攻克惠州的标语。

十九点：我同副师长讨论了敌人可能的溃逃路线。把攻克惠州的消息通知了友邻部队。我担心敌人不按我们所预料的路线撤退。应当截住他们并解除他们的武装。

二十点四十五分：我与副师长在城里走了走。城里一片欢腾，商店照常营业。我观察着人们的面部表情，劳动人民热情洋溢，笑容满面。

参谋长向我问起苏联的生活情形，我们未来的前途，就这个话题我们聊到半夜。他们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能不能有私人的房子？积攒起来的钱怎么办？可不可以辞职？挣的钱够不够养家？妇女如果生了孩子怎样工作？那些在日本经商的俄国人究竟是些什么人？现在在中国有的俄国人在擦皮鞋，他们能否回俄国？有没有失业的人？等等。在交谈中，我讲了苏联的宪法，而这个宪法就已经回答了许多问题了。

应当说，我有机会与之交谈的军官也好，士兵也好，